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1.004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历史机遇、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唐秀华, 杨艳

摘要: 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核心在于探讨人如何摆脱各种束缚, 批判与超越资本逻辑下人的异化生存状态, 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最新科技成果, 深刻变革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促进劳动形态的蜕变、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发展维度的跃升, 为使人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提供物质基础, 为人类解放以及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历史机遇。但是, 人工智能也是一把“双刃剑”。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劳动异化呈现新形态、社会分化新加剧以及主体性的新消解。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看待人工智能的双重性, 才能抓住人工智能所赋予的历史机遇, 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现实挑战,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为此, 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致力于系统阐释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解放”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 进而探索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实践路径: 即在生产层面推动劳动解放与分配正义; 在制度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在主体层面秉持“技术为人”, 重塑人的主体性; 在全球层面推动技术共享与协同共治。唯有如此, 方能使人工智能从潜在的异化工具, 转化为推进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性力量。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人的解放; 历史机遇; 现实挑战;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B038;TP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6)01-0034-11

收稿日期: 2025-12-11

作者简介: 唐秀华(1969—), 女, 四川遂宁人,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mail: tangxh@lzu.edu.cn; 杨艳(2001—), 女, 宁夏吴忠人,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1]等新要求。这意味着,如何把握人工智能所赋予的机遇,使其赋能全人类解放进程、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已成为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实现无产阶级

的彻底解放与全人类的自由发展,这一理想不仅构成马克思毕生理论探索与实践追求的旨归,也为审视当代科技演进提供了理论坐标。人的解放理论由三重维度构筑起其整体框架。从存在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35}。这一经典论断揭示了人的解放的实质是打破束缚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枷锁,使人从“物的依赖性”阶段迈向“自由个性”阶段。从劳动过程维度看,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维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不自由”。其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成为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异己力量”。其二,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人的“类本质”,而是成为“被迫的、痛苦的谋生工具”^{[3]93}。其三,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是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实现自我创造的能力,即“自由自觉的劳动”,但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异化劳动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57}。其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劳动产品、劳动以及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最终导致人与人的异化,形成“人对人的剥削与对立”^{[3]97-98},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工人之间的竞争,最终使人与人的关系沦为“物化关系”,失去了真正的社会交往本质。而解放的目的恰恰在于扬弃这四重异化,使劳动回归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从历史目标维度看,解放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格外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说“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4]372}。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的解放提供物质支撑。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的作用发挥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5]48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的发展往往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加剧人的异化。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科技才能真正成为推动人的解放的力量,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一、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历史机遇

“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6]494}。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化生产在解放人的体力与重复性劳动的同时,也在培育人的数字能力、创新思维和协同精神,为人的全面发展书写新的时代篇章。生产力的这种飞跃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智能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并且将人从繁杂、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自由时间也相对增加,这也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实现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因此,要牢牢把握时代赋予我们的发展机遇,利用好人工智能这一科技至关重要。

(一) 劳动形态的蜕变:从“异化劳动”向“自主活动”趋近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带来自由时间增量。“充足的自由时间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只有拥有了自由时间,人才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拓展社会交往,丰富自由个性,从事科学、艺术等较高级的活动,最终走向人类解放”^[7]。劳动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规定性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使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劳动异化也达到了极致^{[8]487}。而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机器人、智能算法、自动化系统等,工人得以从危

险、重复、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由时间”随之增加。“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9]681}。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向“自主活动”趋近创造条件。机器人能替代工人完成大量重复性、危险性的劳动,比如流水线作业、高危作业等。这些劳动单调乏味,是异化劳动的典型表现。“机器替代人从事简单劳动,使人们获得充分的闲暇从事更高级的创造性活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10]。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工人从这些程式化工作中解脱,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具有创造性、自主性的劳动。在教学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刻地变革了教育教学方式。不同于传统教学,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内容创造、情境模拟和交互能力,为构建“因材施教”的智慧教育生态系统提供技术支撑。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提出有创意性的教学目标。生成式人工智能接收指令后迅速整合资源,为教学目标设计提供参考资料,协助教师设计出多元的教学方案。此外,人工智能也在重构“劳动—自由时间”的关系。传统的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界限分明,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许多工作可以通过远程操作完成,劳动与休闲的界限逐渐模糊。当智能系统承担70%以上的程式化工作后,人类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将从当前的日均2—3小时扩展到6—8小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时空基础。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使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与生活的有机融合,为“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提供可能,使劳动向马克思所设想的“自主活动”趋近。

(二) 社会关系的重构:从“人的依赖关系”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过渡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35}。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类本质”被异化。只有当人们从压迫、剥削、异化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44}。一个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引起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44}。现如今正在经历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是“新生产力的获得”,因此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必然经历变革。从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社会关系辩证运动的这一论断出发,当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成为“新生产力的获得”的关键载体时,依托大数据全域流通与智能算法动态调度的社会化协作模式,正为马克思毕生所构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前所未有的具体的技术支撑——这种支撑不再是仅仅停留于书本中的理论文字,而是深度结合实际的实践探索,让“联合体”的核心特质从抽象理念走向可感知的社会关系变革。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打破传统协作方式。在传统工业文明下,社会化生产始终被等级结构与空间界限所限制。无论是工厂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分工,还是行业之间以资本为纽带的壁垒分割,再或是不同区域间资源禀赋的静态阻隔,个体的协作参与始终取决于特定的组织权威与物理边界。流水线工人要服从车间主任的生产调度,中小企业难以突破龙头企业的资源垄断,偏远地区的劳动者被排除在核心协作网之外。这种协作模式本质上是资本主导下的异化协作,个体只是生产链条中可有可无的“工具性节点”,而不是具有主体性的协作主体。人工智能的应用,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协作方式。通

过互联网平台与算法系统,身在北欧的程序员能够与东南亚的开发者共同参与同一开源项目的代码迭代,分散在我国城乡的手艺人能够借助智能匹配平台对接全球市场的定制需求。这种协作不再依赖于组织权威的强制分配,而是由算法根据供需匹配、能力适配与目标共识自发组织,个体得以摆脱对单一机构的依附,成为“协作节点”,灵活地接入全球化的生产网络中。

再次, AI赋能的社会化协作本身蕴含着“自由人联合体”所追求的平等、自主与互助。平等体现在算法对协作参与的“去身份化”评估。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个体创作者,在资源对接、机会获取的过程中,都以数据维度的能力指标为核心依据,而不是传统社会关系中的资本规模、身份地位或人脉资源,这使得弱势群体也能够获取公平的协作机会。自主体现在个体对于协作的内容具有自主选择权。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长、兴趣爱好与时间安排,灵活参与不同领域的协作项目。互助是通过数据与知识的共享而得以深化。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协作过程成为“个体价值增值”与“集体能力提升”的双向互动,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但是,这种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趋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仍然需要应对算法霸权、数据垄断等潜在的风险,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马克思所构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53}从理想推向现实。

(三) 发展维度的跃升:从“片面化发展”向“自由全面发展”转变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拓展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的“旧式分工”将人锁定在某些特定领域,导致人的“片面化发展”,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而“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工人要打破资本主义“旧式分工”的压迫,实现智力、体力的统一发展。人工智能将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发展“创造性”思维,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拓展。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的应用重构了资源分配,赋予人“发展主动权”。在“旧式分工”下,资源占有的差异导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因此人们只能选择“为生存而服务的发展方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具有普惠性潜力,能够打破地域与阶层的限制。在教育领域,智能教育平台可以将高质量的教学资源输送到教育较落后的地区,使不同地区的学生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机会和资源。在医疗领域,智能诊断系统可以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医疗服务的普及性。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旧式社会分工的束缚,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时间和空间。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3]67}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被“必要劳动时间”所束缚,“自由时间”寥寥无几甚至被剥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取代了重复性、程式化的工作,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有效破解了“必要劳动”对工人的支配,帮助工人从“为了生存而劳动”的被动状态中解脱。“自由时间”极大地被释放,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时间空间。

二、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现实挑战

马克思曾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中提醒人类,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事物都存在着对立面。“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12]579-580}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人的解放”也是一体两面。一方面,它为人类解放开辟了新空间。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伴随着一系列冲击与挑战。劳动者陷入“数字监控下的异化劳动”,算法霸权与数字鸿

沟加剧社会分化,算法优势垄断发展机会,人们开始依赖技术定义自身价值,人的主体性面临被解构的风险。

(一) 劳动异化的新变奏:数字牢笼的禁锢与结构性失业的冲击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下,人工智能衍生出更为隐蔽的异化形式。“这种异化相较于前智能时代更具隐蔽性与全面性,进而使得智能时代人的解放命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与复杂性”^[14]。人们在工作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人工智能,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甚至在决策时也过度依赖算法的建议,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抖音、快手等APP根据人们的点赞与收藏情况进行推荐,表面来看是用户的自主选择,实则是数字牢笼的禁锢。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算法功能获取用户隐私,根据人们的兴趣爱好进行精准投喂,不仅对人的自主选择权进行干涉,还通过技术对主体进行规训,将人类困囿于狭窄的信息茧房之中,数字劳动的隐蔽剥削日益凸显。在平台经济中,用户数据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工具。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产生的大量行为数据被平台企业无偿占有和利用,转化为商业价值。用户的浏览、点赞、评论等行为都成为一种数字劳动,但他们却无法从中获得相应的报酬,这种无偿数字劳动加剧了异化程度。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是结构性失业与劳动权剥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一些传统岗位被淘汰,一部分人由于缺乏适应新技术的能力,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陷入“无工作的异化”状态。

(二) 社会分化的加剧:数字鸿沟的固化与贫富差距的加大

其一,人工智能技术成为阶级固化的新工具。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悖论,他说“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15]。这一论述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更加复杂且尖锐的现实情境。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成为阶级固化的新工具:数据垄断形成新型阶级分化。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专利大部分掌握在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手中,这种数据垄断使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中心—边缘”的结构。以大语言模型技术为例,OpenAI的GPT系列、谷歌的Bard等核心技术在头部企业的严密掌控中,中小企业由于缺乏算力支持,并且数据资源难以突破技术瓶颈,导致技术创新生态呈现“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这种技术垄断不仅限制了市场竞争,而且使得技术创新红利集中于少数企业与群体,加剧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分化。数据资源的不平等占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阶级固化趋势。

其二,从全球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均衡加剧了南北差距。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垄断地位,将部分发展中国家束缚在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难以实现向上突破。这一权力结构,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技术依附”的挑战。印度作为一个拥有海量数据与庞大市场的数字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着数据主权被稀释与本土创新空间受挤压的双重困境。美国多家科技巨头近期通过向印度用户大规模赠送长期免费的高级AI服务,迅速占领本地市场。媒体称这种策略为“诱饵加转化”。这种策略不仅仅旨在培养用户的依赖性,其更深层的目的是获取覆盖印度多语种、本地文化与消费行为的独特行为数据,以训练和优化全球模型,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印度丰富的数字资源在为外国模型提供“燃料”,而印度的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则在美国科技巨头的免费攻势下由于缺乏用户基础而举步维艰。长此以往,印度可能陷入“数字佃农”的境地——虽然坐拥着数据“沃土”,但耕作的工具、规则与绝大部分收成均被外来者掌握,自主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面临严峻挑战。这种

“数据掠夺”的模式,让技术欠发达地区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困境,难以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实现突破,进而拉大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三) 主体性的新消解:工具理性的支配与存在危机的凸显

“迈入智能社会这样新颖、独特的高科技社会,人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主从关系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人正在丧失作为创造、掌握和利用科技的主人的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适应高科技‘座架’要求的‘附庸’”^[16]。这种从“主人”到“附庸”的异化,正是工具理性通过技术“座架”对人主体性的剥夺与消解。当人被迫去适应技术逻辑而失去自主创造的可能时,存在意义的危机便不可避免地被凸显。

其一,工具理性的支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新的异化形式——智能异化。“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7]⁵⁴。一方面,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导致人的主体性被消解,人们依赖算法建议,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思考能力是独属于人的特性,但是智能系统可以使用户直接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案,用户对于搜索到的信息浅尝辄止,甚至完全不曾质疑搜索结果真实性,从而失去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另外,一些智能APP为了获取流量取悦用户,利用大数据以及算法系统分析用户的偏好并进行精准投送,不仅对用户的选择权进行了干预,并且将用户的兴趣爱好锁定在特定的范围内。用户如同困囿于信息茧房中,信息获取单一化,破坏了信息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信息化时代人不仅没有获得浏览更多信息的自由,反而在‘信息茧房’中自我沉沦,在浏览信息时越来越封闭,引发了更多负面的问题”^[18]。

虚拟与现实的混淆也弱化了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认知。人工智能构建的虚拟世界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体验和互动方式,但也容易使人沉迷其中,导致“符号异化”。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过度追求虚拟的身份和成就,忽视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和社会责任,逐渐失去对现实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数字化生存中,数字劳动者满足于虚拟世界中的形式自由,而无感于自己所身处的被剥削境遇”^[19],呈现出“一种打破时空界限,摆脱物质精神束缚”^[19]的“解放”幻象。

其二,存在危机的凸显。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说道“比起狩猎者,出租车司机或心脏病专科医生所做的事更为有限,也就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我已一再强调,人工智能目前绝无法做到与人类匹敌。但对大多数的现代工作来说,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是多余的。人工智能要把人类挤出就业市场,只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特定能力上超越人类,就已足够”^[20]²⁹²。算法和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将逐步取代那些仅仅依靠体力和标准化脑力操作的岗位,导致部分劳动者陷入生存危机。“这不仅加剧了工人再就业的难度,还可能使其技能退化至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本能的状态,陷入经济贫困与能力贫困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21]。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程中,以人工智能将超越并取代人类为核心观点的“人工智能统治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的恐慌。这种恐慌不仅仅是对未来技术失控的担忧,更是对人类自身生存价值与存在意义的焦虑。“人工智能统治论”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置于对立的二元关系之中,其不仅背离了“技术为人”的根本理念,更割裂了科技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内在关联,由此引发大众对自身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性、主导权及生存价值的深层质疑。

三、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实践路径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思想和知识不可能凭空产生,必然受到我们所处时代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

社会结构和主流观念等条件的限制。人类的认识是渐进式发展的,只有时代提供了相应的基础,我们的认识才能实现飞跃^{[22][94]}。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具有双重性,它在为人的解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风险。由于有限的现实条件和认知水平,人工智能所伴随的潜在的风险是无法预料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的双重性,做好风险防范,使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解放事业,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 生产层面:推动劳动解放和分配正义

“人机协作”这种新兴的劳动形态正成为推动人类劳动解放的关键路径。劳动解放本质上是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实现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解放,并非技术的自发结果,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性变革。这要求在生产领域重构劳动过程与人机关系,扬弃异化;同时还要在分配领域建构与之适配的正义原则。

首先,在生产层面塑造以人的创造性劳动为核心的“人机共生”关系是劳动解放的基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使用,而是对人类劳动本质的回归。为此,必须通过一场深刻的系统性教育改革,构建“创新能力培育+数字素养提升”的双轨育人体系,促使劳动者完成从技术替代对象到智能系统主导者的角色转变。劳动者不仅要掌握驾驭智能工具的能力,更要培育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批判性思维、复杂决策和审美创造等创新能力。由此,劳动者才能从可能被替代的“技术客体”,转变为智能系统的主导者、驾驭者与价值评判者。在这一过程中,人机分工呈现出显著的功能互补性。人类凭借创造性思维与战略决策能力承担起核心价值创造环节,而人工智能系统则凭借算法优势完成数据处理、流程执行等标准化任务,形成人类价值引领、机器效率支撑的“人机协作”新型劳动形态。

其次,与智能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分配制度是解放成果得以共享的根本保障。如果没有公平的分配制度作为支撑,劳动解放成果便可能被少数人攫取,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因此需要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论”与“要素贡献”相结合的复合分配框架,补充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差异化分配机制。在智能化生产中,虽然直接体力劳动减少,但创造性劳动、协调性劳动和情感性劳动的价值日益凸显。只有建立一套科学评估不同形态劳动的贡献度量体系,才能确保劳动报酬真实反映劳动价值创造。与此同时,完善数据、技术、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不可或缺。通过完善数据确权、技术入股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化路径,对数字要素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贡献给予合理的度量。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与动态失业补偿机制等社会保障措施,来有效缓解技术替代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的冲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共享,最终实现分配正义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二) 制度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是对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为人的解放的核心力量的观点确认”^[23]。技术本身没有善恶,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技术奴役。“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人工智能成为资本掠夺工人生产资料和剥削工人劳动的帮凶”^[2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增殖逻辑绑定,衍生为新型异化工具。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的解放以及自由全面发展。现阶段产生奴役的根源在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治理体系、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仍处于构建与完善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他说“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

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24]。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制度层面驾驭人工智能、推动其服务于人的解放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首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共同富裕目标,是确保人工智能发展服务于全人类解放事业而不是资本增殖工具的制度基石。其一,在所有权与决策权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确保了关键数据资源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其被异化为资本增殖工具。其二,在发展方向上,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设定了价值锚点。“共同富裕是要超越个体解放、群体解放的局限性,实现人的解放,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25]。这一价值锚点将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优先推动资源向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领域流动,如智慧医疗、个性化教育和环境治理等。其三,在运行机制上赋能国家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战略引导。唯有如此,才能系统性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根本目的同向同行。

其次,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这一体系的核心是构建一个既能激励创新又能规避风险的制度环境。其一,健全法治体系。加快制定与完善涵盖数据产权、算法审计、人工智能安全标准、责任认定等领域的专门法律法规,将“公平正义”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与标准体系,为防止算法歧视、隐私侵犯和数字权力滥用提供坚实的法律武器。其二,创新治理机制。建立跨部门协同、政企社多元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架构,发展敏捷治理和适应性监管能力。特别是在公共部门部署和影响重大的商业场景中,推行强制性的算法影响评估与透明度报告制度,确保关键算法的决策逻辑可追溯、可审计、可质疑。其三,嵌入价值伦理。推动伦理准则从软性倡导走向硬性约束,通过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定行业自律公约等方式,将社会公平、包容性、人类尊严等社会主义价值深度融入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只有构建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有效防止算法歧视与权力滥用,才能促进数据要素由全民共享,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治理机制,遏制技术垄断与数字剥削,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力量。

(三) 主体层面:秉持“技术为人”,重塑人的主体性

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人类解放事业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当前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正在悄然侵蚀人的批判性思维、削弱人的实践能动性,这实质上是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时代被消解的深刻表征。技术不应该成为支配人类的力量,而要始终服务于人类。“大数据时代需要唤回人性,重构人类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方可逐步消解奴役”^[26]。因此,在文化层面,必须重塑人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倡导“技术为人”的价值导向。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重视和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意味着,我们要从“现实的人”出发,关注人的真实需求,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始终植根于社会实践,依靠人类的智慧并且最终服务于人。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必须植根于人民最真切、最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于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第二,技术发展必须依靠人类的集体智慧,将人的价值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确保算法逻辑服从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共识与正义原则。第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其发展的终极意

义在于扩展人的自由边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只有坚持这一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有力技术武器。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人类的主体地位,科技在任何时候都不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要始终把人的利益和价值放在首位,给予人工智能科学的引导,为实现人的解放而不懈努力。

(四) 全球层面:推动技术共享与协同共治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它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加剧了社会分化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打破技术壁垒、遏制数字垄断,是实现全球技术普惠的重要前提,也是确保人工智能发展服务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前提。“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7]39}。其中便蕴含着技术共享的理念。

首先,倡导并落实实质性的全球技术共享机制。必须坚决反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霸权与单边垄断,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与开放协作。发达国家应履行国际责任,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发,以及大规模数字能力建设等多种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水平,助力发展中国家缩小数字鸿沟、增强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当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逐步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其次,尊重并支持多样化的自主创新实践。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协作网络的同时,必须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置于战略高度,结合本国国情与发展阶段,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培育本土人才与产业生态,逐步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外部技术的结构性依赖,争取在全球化协作中的话语权。

再次,构建以人类解放为最终目的的全球治理体系。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伦理失范、安全风险等跨国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推动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协商制定普遍接受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安全标准与行业规范不可或缺。只有深化国际之间的合作,才能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存在危机等跨国性挑战。只有形成全球性的治理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才能使人工智能不仅仅成为技术进步的象征,更是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与解放的有力武器,真正惠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四、结语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预言,“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8]219-220}。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这一预言成为现实。它不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重塑社会关系、赋能人类解放。我们的使命是驾驭这一历史性力量,确保技术进步最终服务于全人类的解放,使每一个个体从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在自由时间中绽放出个性光辉,在创造性劳动中发挥自身的本质力量,在自由人联合体中达到真正的全面发展。然而,人工智能的“双刃剑”作用也不容忽视。它既是赋能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力量,也可以是加剧社会分化的异化工具。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热潮下,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致力于技术突破,还要构建起与之适配的全球治理框架,抓住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机遇,同时也要做好风险防范,确保人工智能技

术良性发展,助推人类解放事业。唯有坚持将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发展的最终旨归,我们才能破除技术工具理性的桎梏,引导人工智能朝着助推人类挣脱物质与精神双重束缚、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的方向稳步前行,最终跨越个体与群体的发展鸿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让科技真正成为赋能人类文明跃升的核心动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0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5] 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吴海江,武亚运.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基于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考察[J].学术界,2019(3): 75-81+237.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孟雨桐.技术进步与人的解放:马克思共同体视野中的技术正义[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5,42(5):114-120.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魏丽.继承与拓展: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逻辑演进与实践路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5): 1-10.
- [1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16] 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119-137+202-203.
-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8] 饶旭鹏,白双航.网络交往中“信息茧房”及人的解放探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1): 16-21.
- [19] 陈天琦,蒋桂芳.数字化生存境遇下“人的解放”问题再探[J].世界哲学,2025(4): 37-46.
- [20]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21] 韩喜平,周璐.具身智能发展背景下人的主体困境及解放途径[J].学术界,2025(11):63-73.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3] 王秀成,陈欣.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优势、风险与实践策略[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23(5): 112-121.
- [24]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5-04-26(1).
- [25] 刘贤峰.人的解放视域下的共同富裕[J].社会科学家,2024(3): 32-37.
- [26] 习生富,冯桂锋.消解技术奴役:探寻大数据时代人的解放之路[J].学术研究,2018(12): 12-18.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Human Emancip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NG Xiuhua, YANG Yan

Abstract: The core of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emancipation” lies in exploring how humans can break free from various constraints, lies in criticiz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alienated existence under capitalist logic to achieve their own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s humanity’s late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is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ways of life. It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forms,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elevation of developmental dimensions, provid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enabling humanity’s transition from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o the “realm of freedom”. This offers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human emancipation and free, all-round development. However, AI is also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s led to new forms of labor alienation, newly intensified social divisions, and further eros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Marxism to view the dual nature of AI can we seize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it affords, address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it poses, and actively explore practical paths through which AI technology can empower human emancipation and free, all-round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and grounded in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arxism, our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nd realistic challenges facing “human emancipation” in the age of AI. It further explores socialism-oriented practical paths: to promote labor emancipation and distribution justice at the production level; to uphold a “human-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for the people” to remold human subjectivity at the subjective level; and to foster global technological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t the global level. Only in this way can AI be transformed from a potential tool of alienation into a revolutionary force advancing the cause of human emancip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emancipation;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realistic challenges; practical paths

责任编辑:胡金频